

元代山西的官办庙学

瞿大风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有元一代, 官办庙学是各级政权设在孔庙之中进行有目的、有系统地传授知识的专门机构, 亦是各地开展教育活动的主要途径之一。山西地区的官办庙学大多建在路府州县的治所之中, 规模大小各不相同, 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本文拟就河东山西官办庙学的施教内容、祭祀制度、藏书建设与学田占有等若干方面加以考察, 且与江南地区略作比较。

关键词: 元代; 山西; 江南; 庙学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有元一代, 山西地区的官办庙学大多建在路府州县的治所之中, 规模大小各不相同, 不仅在施教内容、祭祀制度、藏书建设与学田占有等若干方面有所不同, 且与江南地区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 值得考究。

(一)

关于官办庙学的施教内容, 元朝名儒许衡最初建议: 上自上都、中都下及司县皆设学校, “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 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 自洒扫应对至于平天下之道”, 以使学子“上知所以御下, 下知所以事上, 上下和睦”。^[1]元朝儒士张起巖认为“圣贤之训具于六经之文, 文所以载乎道也! 崇文匪徒为夸大也, 崇其道也!”^[2]元末名臣吕思诚主张: “士以明体适用为学”, 即以“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盖欲大有为世”。^[3]因此, 官办庙学的施教内容主要在于传授孔子的政治思想, 强调“诚意、正心、修身, 以治国家平天下, 其原在致知格物, 以致吾之知, 达则道行于天下, 而收兼善之功”^[4], 反对“为士者不思根极圣道, 以《大学》自任, 区区从事于章句之末”。^[5]

山西地区官办庙学中的施教内容虽然大体囿于许衡建议的教学规范, 所谓“人生八岁则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与夫六艺之文, 十五以上则入大学而教之格物致知, 正心以修其身, 然后齐家以达于治国平天下”, 但在具体内容上却有所变化。随着“近世周、程、张、朱数君子迭起, 尊信孔氏而得其不传之统, 著书立言, 莫非复先正穷理尽性之微, 修己治人之要”。理学传入北方地区以后, 受到官办庙学重视, 甚至采用理学思想与道德观念作为主要施教内容, 以使学子“能于日用人伦之际讲论问辨, 敬守力行, 处家敦孝弟之行, 处乡兴谦让之风, 达而在朝则功名事业光炫史册”。^[6]泽州长官段直效法湖州之学的“经传相授”, 且以“仁义礼乐”作为州学教授内容。元朝后期, “贡举法行, 非程朱学不式(试)于有司”, “天下学术凜然一趋于正”^[7], 理学内容越发成为河东山西官办庙学的施教趋势。

尽管如此，山西各地官办庙学的施教内容较为广泛，并不偏狭，往往涉及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与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交城县学“劝诲生徒，开之以道德性命之旨，博之以经史子集之文”。[8]高平县学在元初之际“以五经四子书，引拔贤俊，先德行，而后文艺”，元末年间则按“四书、六经”作为教育内容。[9]大德年间，潞州知州盖善应敦请儒士辅助教官，先行教导童蒙学习“自洒扫应对，进退动容周旋必中礼，使知子弟当为之职，以消积习骄傲之气”，逐步养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10]石州州学的施教内容涉及“易、诗、书、春秋、论语、大学、中庸”等有关方面。康熙在《石州庙学记》中便认为“小学之书而励志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行则学之本立矣！然后先之《大学》，以立其规模，参之论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极于《中庸》，于以穷诸经，订群史立大本经纶大经，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无所为而不成，无所处而不当”。[11]

根据申万里博士有关元代江南儒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山西各地的官办庙学与理学一统天下的江南庙学在施教内容上的差距很大，并非一本朱子之说，唯以读经为主，只将理学作为教学内容，且不重视广泛阅读。这种差距一方面与理学在南北地区盛行程度不同有关，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北方儒士与江南儒士对于庙学生徒应否拘于朱子之学在办学施教中的认识不同。河东山西的汉士大夫杨仁风在读书内容上[12]，明确主张“士之力学者得读所未读之书，得知所未知之事”，这样才能“温故而知新，博学而笃志”，并且认为“诸子百家之书虽小，道必有可观者”，因而应该“浸润经史，贯通古今”。[13]就此而论，上述北方儒士康熙所发有关“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的类似看法可以说是与杨仁风的明确主张不谋而合、大抵一致。

江南地区的江浙、江西既是朱熹家乡及其仕宦所在，又是理学期长期深入发展的正宗之地。相比之下，山西地区沿袭金代“溺于科举之习”，长期受到前代词赋经义取士的深刻影响，形成“终日哓哓记诵，联括诗书语孟”的治学风气，而对“自拔于流俗，以通经学古为己任（者），则必群聚嗤笑，以为迂阔”。不过，这种忽视通经学古、采取广泛的施教内容直接带来一个极不合理，而又无可回避的客观后果，即在元仁宗诏告天下“以科目取士，专尚经术，务求实学，尽变隋唐词赋之陋”的科举之中[14]，河东山西学识渊博的饱读之士面临元朝科举考官多为南官出职操持，尚难具备江南儒士精熟道学、通晓性理与切中时需、左右逢源的优越条件，以致往往名落孙山，登第寥寥。其实，山西地区的文教水平并不低下，词赋功夫相当深厚，因此，科举上榜的人数较少与其说是体现河东山西的文教水平，还不如说是理学发展落后南方的客观反映。

（二）

元朝时期，山西地区官办庙学的祭祀制度大体依循宋、金旧制，所谓“释奠悉如旧仪”[15]，且与江南庙学存在某些差异。因此，南方儒士程端礼作诗论云：“闻说西京学，金源旧制存。两公违配享，列坐失常尊。”[16]诗中指出河东山西官办庙学配享圣贤中的错位情况，所说“两公”系指曾子、子思，“常尊”则指曾子、子思应列孟子之上。

当时，山西地区的庙学祭祀均以孔子居中，颜子、孟子分列两边，其下“各以一代名世者为之”，从祀人数通常为九十六人。至元四年（1267），霍州庙学“正室成栖，神像于中，配以颜、孟十哲”，师儒之室，讲肄之位一应俱全。[17]至元九年（1272），绛州州学中设素王塑像，以颜、孟配十哲侍于东、西两庑，所绘六十二子及大儒二十四人“袞冕皞裳，峨峨奉璋，奎碧辉映”。[5]至元十一年（1274），黎城庙学“塑圣人及十哲像，冕口珠旒”，且以

周制，“邹、兗而下，从燕居之仪，翼侍左右”。至元十三年（1276），河中府构成礼殿，“取颜、孟而下高第弟子十人配食于堂上，从旧制也”，东、西两庑各十七楹，“绘余子从祭其下”。至元十六年（1279），垣曲县庙学塑立圣像三尊，“素王居中，颜、孟侍坐”，后又塑造十哲之像以作配享。大德十年（1306），潞州州学“居夫子南面垂旒被衮，邹、衮两公、十哲之位，侍章施足，绘七十二子、大儒之像为卷轴九十有六。从祀之日张而悬之。讫事于楹中，为礼器三百余事，足供奠设”。[18]

江南庙学因以理学盛行，道统严明，常在大成殿中上奉孔子，下供四配，即为颜、曾、思、孟四贤，从祀人数一般均为一百零五人。正如元人虞集所说“郡县莫不有庙学，其神则先圣南面而坐，颜、曾、思、孟西面坐侑食”。[19]苏天爵亦说“燕居堂以祀夫子，配以兗、郈、沂、邹四公”。[20]由此可知，江南地区与山西地区在祭祀制度上明显存在着南北异制的不同情形。此外，河东山西与江南地区的从祀人数，就其各地本身来说亦不统一。

《续文献通考》强调指出，江南地区诸路庙学皆以颜、曾、思、孟四子配享，而河北诸路庙学“并循亡金之旧，左颜右孟，与夫子并居南面”有悖情理，并解释说，“孟子学于子思，子思学于曾子”，“屈曾子于从祀之中，降子思于于廊庑之末”，会破坏掉封建道统关系。因此，应当“昭公道，尊道统，以崇正学”，“得礼之中”，以使“颜、曾、思、孟并列于夫子之左，虚其右隅，以避古者”，同时主张“自两庑升子张于十哲，以补曾子之阙”，以便形成“天下一家，岂容南北之礼各异”的统一制度。[21]元中书省提举张时髦更是振振有辞地说：“颜子学于孔子，孟子学于圣孙子思，弟子于师伺坐语道”，“弟子端居乎上，师降居乎下”，“于冥冥中不能妥其灵”，何况庙学之设原本“以明人伦”，却又“逆置错陈”，“奚以训天下俊世乎！”[22]这些议论若是出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倒亦情有可缘，理所当然，如果仅是在于将封建家族的辈份观念附会到庙学之中，煞费苦心地论资排辈，极力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则实在是迂腐可笑得很。

延祐三年（1316）秋七月，深受汉族封建伦理纲常影响的元仁宗敕令有司“公议道统，先援之传，宣升曾子、子思于孟子之上，以为万世不易之典”，且又著令“始定兗、郈、沂、邹四圣公，列位配侑，东座西向”。自此，山西地区的一些庙学在兴修之际，开始改立四公之位。曲沃县学便奉命将曾子、子思“实诸孟子之上”。壶关县增修宣圣庙时，“命工改为曾、思像偕颜、孟以次，列诸左右，师第祖孙，奠厥攸居”。至正年间，永和县重修庙学以后，“首作礼殿”，殿中孔子之傍改为颜、曾、思、孟列于左右，以使“道统师承始合典制”。然而，河东各地的大多庙学依然故我，“鲜有奉行者”，往往仍按旧制之中孔孟为尊的位序排列。[23]

元朝时期的庙学祭祀依照规模分为释菜、释典两种，“小则释菜以食为主，大则释典以饮为主”，“舍菜合舞于春，颂学合声于秋”[24]，并且均有乐器伴奏。平阳路总管张浩然在《春丁即事》中题写这种情形时云：“一代文章复炳然，泮宫俎豆会郡贤。阑珊灯火入归后，门掩西风又隔年。”[25]元人沈钟作诗叙云：“素王万世道弥尊，祀享春秋典礼敦。□筐满庭陈祝幣，鼓钟在虞荐饗殮。六经删述原无恙，二氏荒唐敢并论，精爽洋如神在上，棖星灯火耀重门。”[26]

《元史·祭祀志》提到，“国家化民成俗，莫先于学校，而学校之设，必崇先圣先师之祀者，所以报功而示劝”。[27]庙学祭祀分为三种，即为庙学落成或地方官员到任之时的释菜之祭、每年二月和八月第一个丁日的入学丁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举行的朔望释奠。修建庙学完工告成必祀先师，礼莫其大。至元十年（1273）春二月，闻喜庙学重修以后，释菜礼以“告成厥功”。是年秋八月，太平县文庙在建成后，同样举行释菜之礼。[28]至正九年（1349），高平

庙学完修之后，“行释菜礼，老幼聚观”。“士之入学，则释奠于其先师”，“为学官者，四时合乐，释奠于其先师”。[29]

通常，这种祀日往往选在春秋祭日与每月朔望之中隆重举行。每遇庙学春秋丁祭，地方官员总是率领同僚吏员、师儒诸生与里闾秀民一道依时行祀。元初之际，泽州长官段直“率僚属，具牲币”，“远近学者毕集，髻童执礼，登位踞立，靡不中节”。[30]行祀之时，诸色人等“衣冠严肃，牲醪精洁，乐奏九成，观者如潮”，整个场面“盛服执笏，奉牲用币”，“燔燎炜煌，金石锵鸣，瑚簋布列，降酌登献”，且又“宾相有位，三献在庭，登降跪拜”。[31]

官僚属吏、师儒诸生与里闾秀民揖逊升降于衣冠俎豆之间，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殊作用：一是“使民观礼，识古以节性，日进于善”[32]，借以促使郡邑人家劝忠知孝，实践孔子“天人经纪之道”的伦理思想；[33]二是通过“释菜奠币于先圣先师，示不忘本”[34]，常怀圣贤宣仁讲义、教民化俗的丰功伟绩；三是充分展示“泮宫之崇，以扶儒宗”，扩大儒学的社会影响。

庙学祭祀的各种活动对于尊师重教，密切政教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经常举行朔望祭祀有助于地方官员参与教学，解经释典。绛州兴修庙学以后，知州李荣祖每逢“朔望与博士、弟子亲释经旨”。[35]阳城县尹赵绳祖常于朔望之日亲自参与释菜致祭。[36]文水县尹许继诚遇有朔望，“则率诸吏告祝，进诸生于冠集堂以肄讲焉”。[37]

(三)

官办庙学在藏书建设方面一般均设尊经楼，用以收藏各种典籍，课诸经生，以便广泛读书，博学立志。元初之际，泽州长官段直想方设法置书于州学，甚至“购求多方”，以致“私家所藏、麾下将佐及趋走吏所得，莫不出之”，还从宋德方处获得《道藏》，“兼收普蓄几万余卷”。[38]

大德年间，潞州知州盖善应购置官书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卷，“筑楼以贮之泮宫，以资学者肄业之本”，以使学子得读所未读之书，得知所未知之事，且将这批官书“贮之于楼，恒不致风雨虫鼠之所蠹耗损坏，以待后之学者”。大德十年（1306），潞州州学增藏图书三百八十余卷。[39]当时，州学书楼所得赠书“半出郡人捐送”，其中包括有《雷氏易祖庭记》、《圣政要括》、《宋实录》、《輿地类考》、《五朝言行录》与《唐三百家诗》等多种图书。[40]延祐二年（1315），黎城县尹白谦目睹“学校荒芜，无书可读”，“首出藏书为吏民倡，又规赢息，市经、史、子、集，共四千二百二十七卷，资士人观阅”，又建藏书楼加以贮存，“其功在学校尤巨”。[41]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山西地区官办庙学的藏书建设内容广泛、数量较多，体现出北方地区庙学建设的藏书特色。相比之下，江南庙学虽然经济实力雄厚富足，但因受到独尊理学，不必多读的片面教学思想影响，因而没有达到如此丰富的藏书规模。

有元一代，庙学学田通常来源于官府给田与个人捐赠，而以官府给田为主。元人柳贯说过“凡学田皆官给，岁籍赋租，以供春秋时祀，师生饩廩，其疆里步亩，载之户曹之版，明且悉也。”[42]明人王云凤所撰《辽州学田记》同样提到：“宋元学皆有赐田。其无田者，则守令之贤必为给之，上无所禁”。[43]

山西地区的庙学之中同样拥有学田，以资日用，所谓“庙以观其礼，学以育其士，田以给其用”。[44]泽州长官段直在泽州州学重修以后，“取负郭良田千亩”作为学田；[45]潞州之外“四围官壕地尽付于学，永为贍给”，以备朔望祭祀与师生廩饩之用；[46]大德二年（1298），平遥县“拨境内闲田，以为贍给之费”；[47]大德十年（1306），石州达鲁花赤“拨系官闲田若干亩，以供养士之费”；[48]延祐五年（1318），襄陵县尉刘焱“奉典谨付迫城之畝，迹鄽之基，充贍教谕，以纲维之直学，以簿贮之出纳”，“非兴修释奠不敢动”；至正年间，沁水县尹陈荣亦为庙学置有学田三所。对于县学学田收入的使用情况，县之令长“时省视焉”。[49]

尽管当时“圣贤之祀享，弟子之膳羞，是皆学田所出”[50]，但是，山西各地庙学之中的学田数量比起江南地区来说一般较少，涉及千亩以上情况的记载不多，办学基础较为薄弱。[51]因此，除了拨给学田以外，有的地方采取其它维持庙学的资助方式。泽州天井关便是采取邸舍房课作为释奠之资。大德十一年（1307），又将兴修庙学所余经费募人营运，岁取利息用于祭祀。至顺三年（1332），县尹裴从善再次兴修庙学以后，照旧“给付富实之民”依前营运，且将“存本取息及店课”所得，供给春秋祭祀之时，“从实销用”。[13]不过，这类助学经营方式的记载很少，并不普遍。

元朝时期，山西各地庙学学田被人无理夺占事件“因循以应”，几乎达到“例十郡五、六”的严重状况。元初之际，刘杰担任知潞州事期间，遂以“生徒受业者岁中无以食”，曾于柳林中拨闲田四顷作为“释菜之资”及舍中“晨昏之餐”。至元二十八年（1291），诸王小薛“得分牧地上党，而学田籍故闲田中”，因以被占作为牧地。后经潞州学正程世文据理力争，“与王辩论，不避利害”，方使小薛不得不交还学田。所谓小薛“贤王复有赐田地美意”，召见程世文以“知分地中有隶学校者，吾不可夺，汝善收取”，而下教令将所占田地尽付于学的有关记载，似为言过饰非之语，可以看作是借以维护学校田产的曲意说词。[52]

就此而言，有的县中庙学学田不止一次遭到夺占，因而对于山西地区的庙学建设造成不利影响。高平县庙学“有田奇三百亩”，募民耕种，岁收所入则“供释典，备廩饩”，并且专门立碑记事。天历年间，学田“夺于州校”，庙学渐渐匮乏不振。至顺二年（1331），里社耆老施舍若干田地，“以供释奠”。随后，学田先被“侵于异端”，复又“据于道家”。县学教谕杨铎投诉邑署，报请于州。时值聂仲礼来尹是邑，“下车诣庙，释舍菜礼”，并主其事，遂与达鲁花赤、簿、尉、吏等人经考诸碑，商议归还被夺之田。其间，又逢部使按巡纠举，据理相赞处治其事，“召道者抵其罪”，且以“众相视，正经界，立封植俾归于学”，不得“为强纵辩狡者所据”，乃使高平庙学复有其田。[53]上述事例均属被夺学田归还原主的有关情形，至于长期占而不还或未被记载的夺田事件还不知究竟能有多少。

元朝时期，山西地区官办庙学与江南地区庙学建设的种种差异，可以说是南北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的发展中存在差距的具体反映。这种差距对于全国各地的人才培养、科举仕进、文教水平与社会风貌无疑均会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因而有待于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元文类[M].卷十三,《时务五事》.

[2]张钦纂修.大同府志[M].卷十五,《崇文堂记》.

- [3] 安雅堂集[M].卷六,《省部政典举要序》.
- [4] (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三,《猗氏县重修学记》; (清)周景柱等纂修.蒲州府志[M].卷十九,《艺文》。(乾隆二十年刊本).
- [5]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M].卷五十二,《绛州重修夫子庙记》.
- [6] (清)徐品山修,陆元鏞纂.介休县志[M].卷十二,《新文庙记》.嘉庆二十四年铅印本.
- [7] (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三,《泽州重修文庙记》;卷十四,《赵忠简公祠堂记》.
- [8] (清)夏肇庸纂修.交城县志[M].卷九,《重修庙学记》,光绪八年刊本.651.
- [9] (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三,《重建高平孔子庙记》;《高平县庙学记》.
- [10] 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九,《潞州学斯文楼记》.
- [11] 安熙.默庵集[M].卷三,《石州庙学记》.
- [12] (清)俞廉三修,杨笃纂.代州志[M].卷九,《集传》.光绪八年刊本.
- [13] 申万里.元代江南儒学与教官群体研究[M].南开大学博士论文.第95页.
- [14] (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三,《潞州重修庙学记》;《首阳书院记》.
- [15] 元史[M].卷七十六,《祭祀五》.
- [16] 程端礼.畏斋集[A].四库全书[C].卷二,《寄托王仲肃三首》.
- [17] 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六,《河中府庙学碑》;卷二十五,《霍州学记》.
- [18] 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一,《黎城圣庙记》;卷二十六,《河中府庙学碑》;卷二十九,《垣曲文庙记》;卷三十,《长治重修文庙学记》.
- [19] 虞集.道园学古录[M].卷三十,《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学记》.
- [20] 苏天爵.滋溪文稿[M].卷二,《盱眙县崇圣书院记》.
- [21] 续文献通考[M].卷四十八,《学校二》.
- [22] (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三,《壶关县增修宣圣庙记》.
- [23] (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三,《曲沃县重修学记》;《和顺县重修夫子庙碑记》;《永和县重修庙学记》.
- [24] 柳贯.柳侍制文集[M].四部丛刊,卷六,《策问》.
- [25] (清)钱以塏纂修.隰州志[M].卷二十四,《艺文》,康熙四十八年刊本.
- [26] (明)张钦纂修.大同府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卷十八,《庙学》.
- [27] 元史[M].卷七十七,《祭祀六》.
- [28] 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五,《闻喜重修庙学碑》.
- [29] (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三,《高平县新修庙学记》;《长子县重修文宣庙记》.
- [30] (明)李侃,胡谧纂修[M].山西通志卷十三,《泽州重修文庙记》;刘因:《静修集》卷十六,《泽州长官段公墓碑铭》.

- [31] (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三,《乐平重修宣圣庙记》;《大宁县建创夫子庙碑记》;《河津县新学记》.
- [32] 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八,《运城孔子庙记》.
- [33] (清)邓必安等修.孝义县志[M].卷一,《重修学官记》,乾隆三十五年刊本.
- [34]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M].卷五十三,《絳州曲沃县新修宣圣庙碑》.
- [35] (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三,《曲沃县重修学记》;《絳州重修夫子庙记》.
- [36] 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八,《赵绳祖兴学记》.
- [37] (清)范启埴,王炜修,阴步霞纂.文水县志[M].卷十二,《艺文》,绪九年刊本.
- [38] 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三,《泽州重修文庙记》;刘因:《静修集》卷十六,《泽州长官段公墓碑铭》.
- [39] 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九,《潞州学斯文楼记》;卷三十,《长治重修文庙学记》.
- [40] (清)陈泽霖鉴定,杨笃纂修.长治县志[M].光绪二十年刊本,卷四,《重修宣圣庙疏》.
- [41] 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三,《高平归正学田记》;(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三,《高平县学田记》.
- [42] (清)觉罗石麟纂修.山西通志[M].卷三十五,《学校》,雍正十二年刻本;雅德.山西志辑要[M].卷三,《潞安府黎城》,乾隆四十五年刊本.
- [43] 柳贯.柳侍制文集[M].四部丛刊,卷十五,《处州路学归田记》;(民国)李世祐修,刘师亮纂.襄陵县志[M].民国十二年刊本,卷二十一,《元路学钱粮记》.
- [44] (民国)张夔典总裁,王玉汝纂修.和顺县志[M].卷十,《辽州学田记》,民国四年铅印本.
- [45] 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三,《高平归正学田记》.
- [46] (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三,《泽州重修文庙记》.
- [47] 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长治重修文庙学记》.
- [48] (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三,《平遥县重修庙学记》.
- [49] 安熙.默庵集[M].卷三,《石州庙学记》.
- [50] (清)觉罗石麟纂修.山西通志[M].卷三十五,《学校》;卷三十六,《学校二》,雍正十二年刻本.
- [51] 滋溪文稿[M].卷四,《新城县学田记》.
- [52] 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四,《天井关孔庙本息记》.
- [53] 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六,《潞州学田记》.

Temple Schools in Shanxi Regi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Qu Dafeng

(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Inner Mongolia, China)

Abstract: Temple School was a kind of specific agency established by all-level government office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which propagated knowledge with aim and system. Meanwhile, Temple School was also one of main ways by which various areas carried out education activities at that time. The government-ran temple schools in Shanxi Region mostly were set up capital spots of Lu-Fu-Zhou-Xian and had various scales. This paper plans to examin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eaching content, sacrificial system, book collection and attached land and compare with those in Jiangnan Region.

Key word: Yuan Dynasty; Shanxi Region; Temple School

收稿日期: 2010-04-27;

作者简介: 瞿大风(1954-), 男, 汉族, 浙江杭州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元史研究。